

資料一：

然而內藤(湖南)史學則將重點置於中國內部的變遷，強調在社會、政治上中世的貴族沒落，而庶民勢力的興起，在文化上歷來的貴族文化衰落，而以新興庶民階級為背景的新文化誕生。(....後文略)

根據內藤學說，在中世貴族已經沒落的近世，壟斷政權的皇帝作為舊勢力的唯一代表殘留下來，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約束地行使獨裁權力。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貴族的掣肘，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針，此外在宮中還苦於宦官的跋扈，甚至廢立之權都掌握在宦官手中。在唐代末期，這一弊害尤甚。然而在進入近世、君主的獨裁權力得以確立後，宦官的地位卻因此而下降。雖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被認為不下於唐代，但宦官恣意弄權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時候，一旦天子發現並解職，不管之前多麼橫暴的宦官也會立刻喪失地位和生命。這種天子獨裁的政治形勢從宋代到清末，持續了約九百五十年，這是確切的事實。

引自《宮崎市定中國史》25 頁

請試從「中世(中古)」、「近世(近代)」的時間軸，去理解「皇帝」、「貴族」、「庶民」、「宦官」之間的權力演變。

資料二：

我們將中國中世的政治形態理解為貴族制度。這是內藤湖南博士提出的說法，認為當時實際領導社會的勢力不是皇帝，而是貴族。皇帝大多是出身軍閥的暴發戶，因而缺乏教養，而且因為革命頻繁，短命王朝很多，皇帝的門第遠遠比不上累世貴族，也不被一般人所尊重。然而，有些貴族之家淵源遠至漢代，在亂世之中依靠家族的凝聚力維持著中國的傳統文化，是生來的精英。他們各自將家門的古老歷史和高貴地位作為榮耀，婚姻之際都要比較門第，認為門當戶對之後才可能聯姻。從這種貴族的價值觀來看，帝王之家只是身分遠為低賤的門第。

當然，帝王是最高權力者，如果有敵對的貴族，可以將其殺掉並滅其家。但就算能夠擊潰單個的貴族，也不能對貴族集團全體發號施令、隨意操縱，不能實施侵害貴族集團利益的法律和政策。如果失去了貴族集團的信賴，天子也無法保住自己的地位。

引自《宮崎市定中國史》44 頁

資料三：

宋代一科舉官僚

官僚是天子的代理，理應成為人民的表率，因而不能將財政能力作為招收官僚的首要條件。政府還是通過自隋唐以來逐漸流行、也在民間得到認可的科舉，來選拔有文學、經學之才的士人，任命為官。但通過科舉難關贏得進士稱號的新人們，很難有機會繼續研究學問或者耽溺於寫詩作文。他們大多首先被任命為地方官，而地方官的表現首先便是根據徵收租稅的成績來評價的。因而新上任的官僚不管願不願意，都要面對經濟、財政

的實際狀況。他們的成績會報告給中央，而升遷的快慢也取決於成績的好壞。作為官僚首領的天子，也無法安閒度日，他要與大臣們一起為了人事的升降和國庫的盈虧而操心費神。而最重要的是，絕不能虧欠官僚和軍隊的工資。如果到了拖欠軍餉的地步，天子也保不住自己的位子。實際上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，明朝滅亡便是很好的例子。

引自《宮崎市定中國史》55 頁

資料三：

唐朝初期，朝廷的官僚大體上有三種出身。…，第三種是中國的土著豪族乃至貴族，被稱為郡望。他們大都可以追溯到漢代的古老門第為榮，在南北朝戰亂時期藏身地方，培植自己的經濟基礎，到了和平時期，又以地方為立腳點，進入中央政府，尋求顯達的地位。在長期的歷史中，這些貴族之間自然形成了全國性的排名。在唐代，崔氏和盧氏被認為是地位最高的名族，按照貴族社會中的評價，和他們相比，天子之家李氏也不值一提。

引自《宮崎市定中國史》222 頁

宋代—科舉官僚

官僚是天子的代理，理應成為人民的表率，因而不能將財政能力作為招收官僚的首要條件。政府還是通過自隋唐以來逐漸流行、也在民間得到認可的科舉，來選拔有文學、經學之才的士人，任命為官。但通過科舉難關贏得進士稱號的新人們，很難有機會繼續研究學問或者耽溺於寫詩作文。他們大多首先被任命為地方官，而地方官的表現首先便是根據徵收租稅的成績來評價的。因而新上任的官僚不管願不願意，都要面對經濟、財政的實際狀況。他們的成績會報告給中央，而升遷的快慢也取決於成績的好壞。

作為官僚首領的天子，也無法安閒度日，他要與大臣們一起為了人事的升降和國庫的盈虧而操心費神。而最重要的是，絕不能虧欠官僚和軍隊的工資。如果到了拖欠軍餉的地步，天子也保不住自己的位子。實際上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，明朝滅亡便是很好的例子。

引自《宮崎市定中國史》55 頁

歷來九品官人法與立法的本意相反，成了首位貴族主義大本營的護符，因而楊堅將其廢除，開始實施以才能為本的科舉，這也反映了同樣的意向。

引自《宮崎市定中國史》214 頁